

文/周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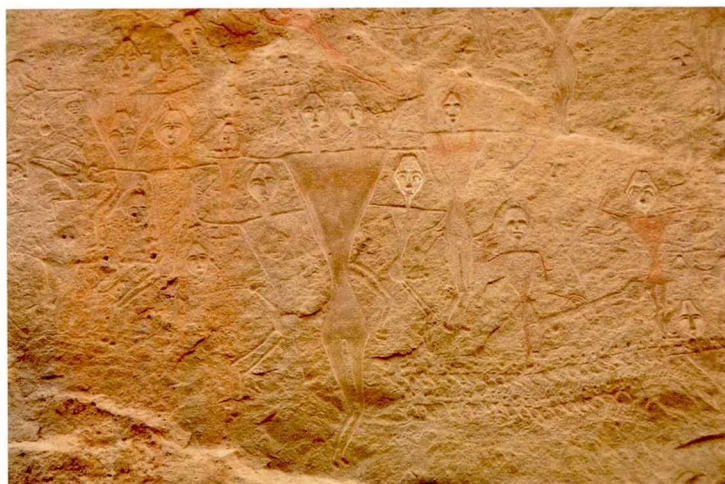
## 新疆文物中的西域舞乐

新疆古称西域，这里的古代舞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传承了千年的艺术精粹，也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及名人雅士诗词歌赋中所记载

的西域歌舞艺术，当代的我们无法亲见，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却将这些场面定格在了中原和西域两地的各类文物中，让我们有幸重温历史、感受舞乐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正是它们见证了舞乐艺术在文化交流中的

发展与繁荣。

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一些古代文物遗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域古代艺术家是如何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位于昌吉州呼图壁县，距今



图一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的舞蹈形象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图二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彩绘苏幕遮舍利盒上的舞蹈形象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3000 多年前的康家石门子岩画（图一），在这座陡然耸立 200 米上下的褐红色山崖距地面 10 米左右的崖壁上，刻绘了二三百个大小不等、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岩画采用浅浮雕的手法，画面中的人物以表现群体性舞蹈动作为主题，部分内容直白或隐晦地表现了男女交媾的场景，部分图像下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在欢快舞蹈的场面，表现出古人崇拜生殖能力，在祈愿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祭祀仪式上举行舞蹈的情景。除此之外，北疆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哈密地区也都发现了许多舞蹈动作的人



图三 敦煌壁画中胡旋舞形象 敦煌研究院提供

物形象岩画，反映了西域先民在探索生命意义并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舞动的形象嵌入岩石，希望生命的活力如岩石般坚固不朽的希望。

这些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 3000 年前，舞乐艺术交流的盛会，就已拉开了序幕。人们为了讴歌伟大生命，欢庆美好生活，用翩翩起舞表达情感。为了把这些舞乐艺术表演的

动人场面保存下来，当时的人们把其中精彩的场面刻画于岩壁、器物上，反映了西域人民丰富的娱乐生活，保留下了原生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也体现出舞乐艺术在交流中得到的发展与升华。

新疆古代艺术家除了用舞蹈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崇拜、诠释生命的意义以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舞蹈



图四：1 宁夏出土绿釉瓶上的胡腾舞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图四：2 河南安阳出土黄釉瓶上的胡腾舞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图四：3 宁夏出土石门上的胡腾舞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图五：1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舞蹈女俑

图片采自《舞动生命 乐扬心声——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的记忆》



图五：2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舞蹈女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表演也与原始宗教、某种祭祀仪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的就是苏幕遮舞，《苏幕遮》是一种大型歌舞戏，又称乞寒舞，在古龟兹国是每年的七月份举行，具有强烈的群众性和娱乐性。表现的内容：一是乞寒求水，二是破灾辟邪，其演出场面声势浩大，人物众多，气氛热烈。表演者男女皆有，头戴毡帽及面具，假面扮演狗猴鬼神等，边歌边舞，相互泼水为戏，体现了很强的娱乐性。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库车地区的苏巴什古寺西大寺遗址中发现的一个彩绘木质舍利盒（图二），此盒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舞蹈场景。舍利盒的盒盖上描绘的是四身美声鸟迦陵频伽分别手持箏、竖箏、曲项琵琶和类似五弦琵琶的乐器正在演奏，最为精彩的盒身部分绘有21位舞者身穿华丽的舞蹈服。其中10人头戴各式各样的假面具，5位舞者腰间佩剑，6人手持各类乐器鼓乐欢腾，这些舞



图六 陕西出土三彩俑中胡人奏

乐舞蹈形象 图片采自国家文物

局编《丝绸之路》





图七 吐鲁番洋海墓葬出土木质空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者中有仪仗胜蟠，也有童子击掌合节，鼓舞气氛热烈。这些形象具有非常强烈的表演成分，人们用神秘而充满了象征意味的舞蹈演绎着美丽的神话传说，表达着对生生不息的企盼。这种戏剧性舞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逐渐传到了中原地区。汉文史籍最早记载的是《周书·宣帝纪》：“宣帝大象元年（579），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

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乐。”<sup>[1]</sup> 隋朝薛道衡留下了“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的诗句。

除了以上介绍的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舞蹈以外，西域各地的舞蹈也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将西域人民所具有的豪迈、奔放、热情等性格特点，都融入了舞蹈之中。著名的舞蹈“胡旋舞”“胡腾舞”等就因其在舞跳之时，活力四射、节奏明快，以及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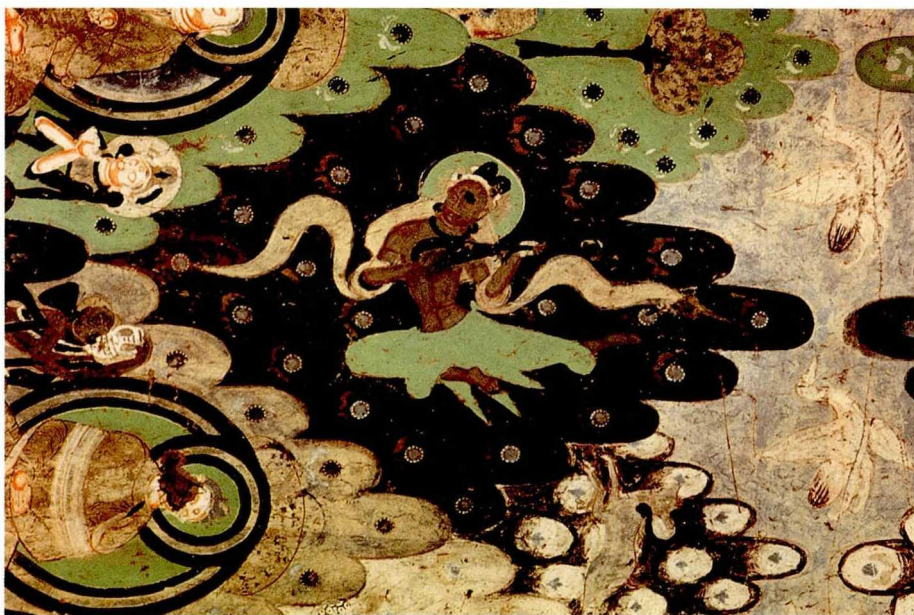
旋转的特点，传入中原之后也受到了热捧。这两种舞蹈的名字，虽然是中原文人雅士命名的，但其前缀“胡”字的定格，清楚地指明了其来自西域。早在北周时期突厥公主阿史那嫁给北周武帝宇文邕，这位精通音乐舞蹈的公主在西出玉门关抵长安时，带出了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地组成的三百人的庞大的西域乐舞队。这些人中可能就有很多舞伎。她们所跳的西域舞，受到内地广大民众的关注，所以才有唐代开元天宝后西域专门进贡胡旋舞女之事。<sup>[2]</sup>

胡旋舞的美妙舞姿也得到了中原诗人的记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胡旋舞》中就写到“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胡旋舞》最初是由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传来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舞。跳起来时，左旋右转，急速如风，因而得名。《胡腾舞》起源于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动作以蹲、踏、跳、腾为主，讲究急蹴的跳腾，故名“胡腾”。由于表演胡旋舞和胡腾舞时所演奏的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乐器



图八：1 克孜尔石窟8号窟前壁壁画中的乐器  
龟兹研究院提供



图八：2 克孜尔石窟196窟主室天相图伎乐天  
龟兹研究院提供

音量大而洪亮,因此渲染出明快欢腾的气势,传到中原后风靡一时。时移世迁,我们虽然无法再看到唐代矫捷豪放的胡腾舞了,但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唐代胡腾舞文物中,领略到这种曾经风靡全国的神奇舞蹈。如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图(图三),宁夏与河南安阳出土陶釉瓶及石门上的胡腾舞(图四)等,陶釉瓶腹两面刻画同样的“胡腾舞”图,画面中央是一舞者,头戴尖顶帽,身穿翻领长衫,腰系宽带,脚穿长筒靴,做扭动踢踏舞蹈状。在他的右侧站着两个人,一人执钹,一人弹琵琶。左侧一人吹横笛,一人击掌伴唱。五人均深目高鼻,着胡服,显然为西域胡人。

胡腾舞、胡旋舞在唐朝时期可谓盛行成风,从宫廷到民间,出现了“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指胡旋舞)”“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动人情景。唐代诗人刘言史看胡腾舞后所写诗篇《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诗句前几句都是在描写胡腾舞的细节,是在强调胡腾舞的观赏性极强,最后一句说的是等看完舞、喝完酒、听完曲子,已经是快要天亮了。由此可见,胡旋舞和胡腾舞在中原地区的热捧程度。

除了“胡旋舞”“胡腾舞”以外,长袖舞、阔袖舞、飘带舞等也十分流行。通过舞蹈这种艺术性极强的形式,极大促进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新疆古代舞乐艺术发达之盛况以及中原舞乐文化的交流情况,从新疆及全国各地保留下来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吐鲁番阿斯塔纳唐西州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舞泥俑(图五),从舞姿及服饰来看,有一些就颇具中原风格;而地处内地的河南汉墓浮雕式画像砖上,有深目高鼻的胡人舞蹈形象;再比如陕西出土的一件三彩俑(图六),上面塑造了5位舞乐人,有汉人形象的,还有类似今天新疆少数民族形象的,其中一位绿衣舞者典型的胡人形象,其体势动态妙趣横生,新疆古代舞蹈的特征颇为鲜明……凡此种种,

充分展现了新疆古代舞乐艺术与舞乐相互交流、渗透的文化现象。

舞蹈和音乐是相伴而行的,而音乐的伴奏首先需要器乐的发明和制作。新疆古代乐器的制作历史悠久,这里的先民自古好乐,且擅长乐器的演奏,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五行志》等史书记载,在汉朝时期,乌孙、匈奴人创造的笛、琵琶、胡琴等器乐传入了中原,同时中原的琴、箏、钟、鼓等也传到了西域诸地,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演奏技艺,促进了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音乐文化的繁荣。

竖箏篥,汉代时由西域传入。《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箏篥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竖箏篥是弦乐器中在西域出现时代较早的,根据新疆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至少在距今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西域居民就已经使用竖箏篥了。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及鄯善县洋海古墓中,都出土了木质的竖箏篥,且保存较为完整,均为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上口呈长圆形,底部正中有三角形发音空,口部蒙皮。弦是由羊肠衣制作而成。在洋海古墓出土的竖箏篥目前确定为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竖箏篥(图七)。由此证实竖箏篥“非华夏旧器”一说。

箏篥,古代吹奏乐器,是西域龟兹地区发明创造的一种乐器。南北朝时期何承天写的《纂文》中记载:必栗(箏篥)者,羌胡乐器名也。<sup>[1]</sup>在隋唐部乐中唐代西凉、高昌、龟兹、疏勒等多用此乐器。在新疆境内发现的龟兹壁画中,也常见到这种乐器。

琵琶,在西域乐器中占据了首席地位。其种类繁多,有五弦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等,有2000多年的历史。南北朝时期由龟兹传入内地。


羯鼓,南北朝时期经西域传入内地。羯鼓两面蒙皮,古时龟兹、高昌、疏勒等地的居民都使用羯鼓。

传到中原的西域乐器有竖箏(后来的萧)、横笛、箏篥、唢呐、胡琵琶、五弦、竖箏篥、弓形箏篥、羯鼓等,后来经过汉民族改造后逐渐成为最常用的传统乐器。文化交流是双向

的,西域乐器传入中原的同时,中原大地流行的乐器也受到西域人民的喜爱,在西域出土的文物及发现的壁画中频繁出现中原的流行乐器,比如阮、咸、箏、排箫等。

无论是来自中亚地区的乐器、中原地区的乐器抑或是西域本地的乐器,在龟兹现存的遗迹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图八)。壁画中所绘乐器种类丰富,有箏篥、琵琶、阮弦、箏篥、箫、羯鼓等,生动形象,仿佛传出了千年的遗响,节奏鲜明,铿锵有力,可以说无声的音乐洞窟却演奏出了华丽的丝路音乐篇章。

西域舞乐的东传,不仅使中原舞乐本身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原地区人们的审美观念、生活情趣,以及娱乐活动的内容。西域舞乐自古就闻名于世,古有“试舞一曲天下无”,今有“万方乐奏有于阗”,由此可见西域舞乐对中原舞乐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

概而言之,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就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了密切的交往,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音乐舞蹈艺术方面的相互交流。西域的舞乐艺术传入中原之后,对中原舞乐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相互交流影响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杜甫等留下了“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等许多描述西域歌舞的诗篇,成为中原与西域舞乐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1] 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8页。

[2] 吴艳春:《丝绸之路与西域舞乐文化——以古文化遗存中图像与实物为主要线索》,《丝路历史文化探讨》,第240页。

[3] 同[2],第242页。